

分类号: C95 论文编号: 1074203040405071

西北民族大学

研 究 生 学 位 论 文

论文题目(汉文) 清代新疆锡伯族移民及其边疆开发研究

论文题目(外文) Xibe immigration of Qing Dynasty and their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 border areas

培 养 单 位 历史文化学院

学 号 S050610071

研 究 生 姓 名 安 阳

学 科、专 业 中国少数民族史

研 究 方 向 中国少数民族族别史

申 请 学 位 法学硕士

导师姓名、职称 王晓燕 教授

论 文 工 作

起 止 年 月 2007 年 1 月至 2008 年 5 月

论文提交日期 2008 年 3 月

论文答辩日期 2008 年 5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08 年 6 月

校址: 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新村 1 号

清代新疆锡伯族移民及其边疆开发研究

论文摘要

我国新疆境内的锡伯族是清政府为加强西北边陲的防务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从东北调往伊犁的。锡伯族到达伊犁后组建了锡伯营，从此开始了他们开发新疆、保卫新疆的伟大历史使命。

有清一代，锡伯族人民为伊犁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锡伯营在当时的“伊犁四营”中是最富足的。他们不仅依靠自身具备的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开垦了大片良田，而且还帮助兄弟民族开凿水渠，传授农业技术。其中锡伯族人民开凿的察布查尔大渠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农业灌溉任务，今天他们仍然依靠这条大渠灌溉着大片土地。

在保卫祖国边疆安全和领土完整上，锡伯族人民更是为其他民族做出了表率。驻守卡伦、换防台站是其长期执行的戍边任务，而每遇战事他们又是常被派往平叛、镇压的劲旅。在平定张格尔叛乱及驱逐沙俄、收复伊犁的多次战争中锡伯族人民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锡伯族人民在保存和发展满语文方面也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清代， 新疆， 锡伯族， 屯垦， 历史

Xibe immigration of Qing Dynasty and their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 border areas

Abstract

The Xibes are originally from northeast China. In 1764,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mbat readiness of the northwest border region, Emperor Qianlong of the Qing Dynasty dispatched the Xibes from northwest China to the Yili region of Xinjiang. When the Xibes arrived at Yili, they established Xibe troop according to the Emperor. From then on, they play a great role to protecting and exploiting of northwest border region of China.

During Qing Dynasty, the Xibes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in agricultural of Yili river basin. The Xibe troop was the most affluent troop in “four troops of Yili” at that time. Not only did they open up vast fertile farmland by wealth agriculture experience, but also help other nations to dug ditches and pass 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he Chabuchar Canal built by the Xibes not only played an important task of irrigation at that time, they still rely on this Canal irrigate farmland today.

The Xibes also set an example to other nations in safeguarding the motherland's border secur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When the war broke out, they still often sent to suppress rebellion, so they were praised for strong army. The Xib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Changka’er rebel” and the war of droved Tsarist Russia off and recovered Yili.

In addition, the Xibes als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preserving and developing the Manchu language.

Key words: Qing Dynasty, Xinjiang, the Xibes, cultivation, history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5
1.1 本课题研究概况.....	5
1.2 难点及不足之处.....	6
1.3 选题目的与意义.....	7
第二章 锡伯族移民与清代伊犁地区的经济开发....	8
2.1 锡伯族西迁概述.....	8
2.2 锡伯营的组建及其内部组织结构.....	9
2.3 兴修水利, 发展农业生产.....	10
2.4 畜牧业及家庭副业的发展.....	13
第三章 锡伯族移民与清代西北边疆的巩固.....	15
3.1 清代新疆的内外形势.....	15
3.2 锡伯营戍边的具体内容.....	16
3.2.1 驻守卡伦、换防台站.....	16
3.2.2 维护内部安定与抵御外侮.....	20
第四章 锡伯族移民与其语言文字及教育的发展 ..	24
4.1 重视文化教育.....	24
4.2 锡伯族移民后满语文的使用及社会因素.....	25
4.3 学习和使用汉语文的情况.....	27
4.4 语言变迁的民族学分析.....	28
结语.....	29
参考文献.....	31

附录一 在学期间的各项成果.....	33
后记.....	36

第一章 绪 论

1.1 本课题研究概况

新疆锡伯族是中国锡伯族的组成部分,新疆锡伯族的研究构成中国锡伯族研究的重要内容。锡伯族移民及其对清代新疆的开发研究在整个学术界中是一个起步比较晚的研究课题。1949 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虽不及其他显学研究那样进展迅速,但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

(一) 史料搜集、整理工作

史料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越丰富,对于从事各项历史研究来说越容易。历史上,专门记载少数民族的资料书籍并不多见,锡伯族作为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因此,要想研究新疆锡伯族的边疆开发活动,只能从浩繁的汉文古籍中去找寻零星的记载。就像已故的肖夫先生所说的“三天功夫能查阅到‘锡伯’二字就是最大的收获。”由此可见,搜集锡伯族资料的难度。

幸而锡伯族史研究的众多学者对这一工作已做出了很大成绩,这给本人的史料搜集工作减少了许多工作量。锡伯族史料的搜集工作是在进行锡伯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过程中展开的。当时,东北锡伯族历史调查组的肖夫先生,乘赴东北地区调查之机,先后到辽宁、吉林、北京等地的图书馆查阅古籍资料和地方志,搜集到不少有关锡伯族的史料,为锡伯族资料的搜集做了开创性工作。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锡伯族史研究专家肖夫、佟克力进一步扩大查阅范围,又整理出近十余万字资料。其中,涉及新疆部分的占有相当比例。与此同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部投入专门的人力、财力,从浩繁的清代满文档案中整理出十余万字锡伯族历史资料。已搜集、整理出的史料有关新疆部分的有:档案资料:《清实录》,佟克力将其中有关锡伯族的史料摘录下来,后来作为《新疆历史资料》第十三辑锡伯族专辑中的重要部分内部铅印。此外,在许多的满文档案中也有不少价值极高的新疆锡伯族史料,目前这一搜集、翻译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成果集中体现在《锡伯族百科全书》中;地方志资料:《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新疆舆图风土考》、《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新疆图志》、《筹办夷务始末》、《擒获张格尔奏折》、《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伊犁府志》及《绥定县志》等。以上这些资料涉及锡伯族的迁徙情况,屯垦戍边、平叛戡乱等方面的内容。本论文的撰写主要也是依据这些原始资料。

(二) 论著出版、发表情况

从事锡伯族历史研究工作的主要是本民族的各位专家。经过专家们几十年的艰辛努力,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清代新疆锡伯族边疆开发史的研究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截止目前,涉及新疆锡伯族(主要是清代)的专著主要有:《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是出版最早的一本介绍性著作。该书主要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在对少数民族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内容不够全面,史料也不够丰富,但它却为以后各位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平台;肖夫的《锡伯族简史》属早期的学术专著,开启了锡伯族史著作学术研究的道路;20 世纪 90 年代,有两部力作相继问世:其一是锡伯族著名学者贺灵、佟克力的《锡伯族简史》,该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大量引用了清代档案资料,而且清代部分又是该书的重点。其二

是《锡伯族百科全书》的问世，它填补了我国缺少单一民族百科全书的空白，是一部全面反映锡伯族历史与文化的中型工具书。该书共 150 万字，收录词目达 2300 多条；2004 年出版的《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资料集，也是对以往古籍资料搜集工作的总结，辑录范围广泛，其中包括古籍文献、档案、方志、论著（民国之前）、游记、调查报告、手抄传本、家谱、外文资料译件等涉及锡伯族直接和间接资料 30 余万字，这给后人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除了以上著作的出版，还有为数不少的论文在各类刊物上陆续发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佟克力的《新疆锡伯族的屯垦业绩及其历史地位》集中、详细的论述了西迁后的锡伯族在清代以屯垦为主的经济生活，这是目前本人所掌握论文中唯一一篇专门论述其经济生活的文章。该文在论述锡伯族军民在自耕自食大搞农业生产，垦荒造田、兴修水利的同时，将其为伊犁地区的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提高到很高的历史层面。作者认为锡伯族军民在伊犁屯垦戍边的成功，为清政府在新疆天山南北两路进行“旗屯”提供了宝贵经验，使清政府对新疆的经营决策发生了深刻变化。肖夫先生的《略谈锡伯族的西迁及其历史贡献》和吴元丰、赵志强的《锡伯族西迁概述》两篇文章，对锡伯族屯垦戍边的历史贡献只是作了一般性的描述，重点论述了西迁的原因及经过。两篇文章在西迁原因方面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为削平准噶尔部贵族的叛乱，抵御和防止沙俄侵略势力继续向东扩张，二是维持边民和平与安全，开发建设边疆，三是让几个民族共处一地，相互牵制，以达到清统治者“分而治之”的目的。其中最后一个原因在其它相关文章中几乎没有提及，这是两篇文章的新观点。但两篇文章在西迁人口数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则属于概括性的论述，如吴元丰、赵志强的《清代锡伯族对祖国的贡献》、丁立军的《新疆锡伯族对祖国的伟大贡献》等，这类文章只是将锡伯族屯垦、戍边方面的历史事实进行了陈述，并未作深入探讨。

关于清代新疆锡伯族在语言、文字及教育方面的论文由于史料缺乏论述极少，本人目前能见到的有如下几篇：佟克力的《解放前锡伯族文化教育发展概述》、何坚韧的《新疆锡伯族教育概述》和《试论色布希贤的教育思想和历史功绩》、包海鹰、吴克尧的《锡伯族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刘成的《锡伯族近现代教育概略》。以上这些文章的共同点就是借助清朝的教育来研究锡伯族的教育问题，并且在引用史料方面也如出一辙，这是史料缺乏所致，从而造成了锡伯族文化教育研究的薄弱环节。从乾隆中叶迁至伊犁至清朝退出历史舞台锡伯族所作贡献除了前文述及的屯垦戍边的经济、军事生活外，更重要的是对满语、满文的完整继承，这不得不说是锡伯族移民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和对中国宝贵文化遗产做出了突出贡献。

1.2 难点及不足之处

首先，作为一个已经有不少人研究过的课题，要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本身就是一件不易的事。从掌握资料的程度上来说，本人并不比前人占优势。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包括一部分档案资料，由于种种原因，笔者未得一睹，故本篇文章中所引用的档案材料多数属于转引，这也给本人的论文写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中记录了锡伯营军事、政治、生产、人物、驻防、屯垦等方面的原始资料，但该珍贵资料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部分被焚毁，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还有一些资料由于公布之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问题，故未能翻译公布，这也是学术领域的一大遗憾。

其次，由于自身条件所限，一些锡伯文资料本人无法看懂，这对于这篇论文来说也是一个缺憾。如《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一、二），该书内容涉及到有关锡伯族西迁、驻防、屯垦等方面的内容。《锡伯族历史资料拾零》中收录的《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部分原文对所研究课题的相关部分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限于本人目前掌握的资料，对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即“锡伯族移民与其语言文字及教育的发展”这一章无法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因而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民族学的相关理论，对锡伯族的语言变迁作了理论分析，以期能够运用民族学的理论分析锡伯族使用双语的历史必然性。

1.3 选题目的与意义

首先，通过对本选题的研究，进一步对清代新疆锡伯族的边疆开发活动做全面、深入、系统的分析与总结，使这一研究课题更加充实、完善，为锡伯族的研究工作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其次，锡伯族是中华民族 56 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研究锡伯族移民在祖国边疆生息、开拓、戍卫及与新疆其他民族一同抗击外侮的史实，不仅有利于对锡伯族民族过程的研究，而且可以进一步完善“各民族共创中华”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论证。

再次，清代迁往新疆的锡伯族距今已有近 250 年的历史，回顾与总结清代新疆锡伯族的光辉历史，对于今天锡伯族的经济、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促进锡伯族社会更加健康、全面的发展。

最后，对锡伯族移民开拓边疆奋斗史的研究还可以焕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自信心，激励锡伯族人民继往开来，继续用勤劳的双手和丰富的智慧为缔造我们伟大的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章 锡伯族移民与清代伊犁地区的经济开发

2.1 锡伯族西迁概述

18世纪60年代锡伯族从东北迁往伊犁的这次西迁被学术界公认为是锡伯族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迁徙。¹其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今天锡伯族东、西两地分布格局的形成。这在锡伯族历史上是一件很有影响且非常重大的事件。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使锡伯族跋山涉水从东北迁往西北，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险阻？下面先就这两个问题略作述论。

民族的迁徙不外乎以下两个原因：即人为因素和非人为因素。人为因素则是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目的强行使某些民族离开生存的土地，如惧其强大使其分化瓦解，出于战争需要派遣其出征驻守等；非人为的因素则是由于天灾人祸迫使某些民族举族迁徙，如地理环境和生存环境的改变，自然灾害的发生等。锡伯族的迁徙则属于前一种情况，其直接的原因便是清政府为了削平准噶尔贵族的叛乱，防止沙俄侵略势力的继续东扩。自17世纪初开始，准噶尔部势力日益强大，成为我国西北地区强大的割据势力。与此同时，沙俄侵略势力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我国北部和西蒙古地区。在内忧外患双重因素的作用下，乾隆帝继其先辈们“筹办未竟之绪”，决定兴师讨伐。乾隆二十年（1755年）年和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年两次大举进攻，削平了准噶尔部贵族的叛乱和大小和卓的叛乱，内忧基本得到解决。为巩固边疆这种稳定的局势，清政府认为伊犁既已是大清的统治范围，且其地方辽阔，不得不派重兵驻守。

明瑞向清政府上奏时说：

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有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甚弃旧习，狩猎为生，技艺尚可，近几年出兵时，未曾遣派伊等。奴才等以为，此项锡伯兵内，拣其优良者一同派来，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²

依明瑞所奏，锡伯族当时过的仍然是狩猎生活，且精通骑射技艺。清政府就是看到这点才决定派锡伯兵丁戍守新疆的。但当这批移民到了新疆后，鉴于他们的实际情况遂改变令其游牧博罗塔拉的决定，安排锡伯族军民到伊犁河南岸耕作。日本学者加藤直人把明瑞对锡伯族的“错误认识”当成是清政府派遣其西迁戍边的不容忽视的原因。³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开始，清政府从东北、西安、凉州、庄浪等地调遣满洲、蒙古、索伦等族官兵进驻新疆发展生产，巩固边防。但清政府仍感力量不足，故又增调锡伯族军民前往戍边。

塔尔巴哈台驻兵一事，虽属重要，亦非当务之急，多等一年，从后年开始办理……塔尔巴哈台驻兵后，于南北两则分兵驻守，设卡、巡查等差颇为繁多，俟换防兵撤回后，伊犁所有携眷遗驻之兵近六千名，恐不敷分驻各处，且伊犁、塔尔巴哈台周围地方极为辽阔，多选派数千名携眷兵遗驻似于一切均有裨益……又查得盛京锡伯兵有四五千名，明瑞等既称其技

¹ 在清代，清朝统治者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对锡伯族曾进行过三次较大的迁徙。其中第一次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将科尔沁蒙古进献给清朝的锡伯人与卦尔察等部，分驻于齐齐哈尔、吉林乌拉和伯都那等新建的木城。第二次从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1699年至1702年），将分驻于齐齐哈尔、伯都那（今吉林扶余县）和吉林乌拉三城的锡伯兵丁及眷属迁到京师（北京）和盛京（沈阳）所属的各城乡。第三次就是本文所说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迁往新疆的这批锡伯族。

² 军机处《满文月摺档》，载贺灵：《锡伯族百科全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2页。

³ 王凌摘译：《加藤直人对〈锡伯族迁徙考记〉的评价》，《历史档案》1987年第2期，第134页。

艺尚可，狩猎又如索伦，相应由盛京锡伯兵内，拣其精壮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员，携眷遣往……¹

军机大臣等奏，据盛京将军舍图肯等奏称，遵旨于盛京锡伯兵内，挑选一千名，挈眷移驻伊犁，应照索伦兵丁之例，派员管理，请选防御、骁骑校，各十员，带领出彰武台，由台站前往……²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明瑞等，将雅尔地方修城驻兵事宜具奏，经军机大臣议，拣发热河满洲兵，达什达瓦部之厄鲁特兵，盛京锡伯兵，约计二千五六百名，现在各令挈眷陆续起程……³

锡伯族的西迁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始进行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清政府从盛京、凤城、辽阳、开原、牛庄、广宁、熊岳、复州、岫岩、金州、盖州、锦州、义州、兴京、抚顺等十五个城乡抽调锡伯族兵丁共计 1000 人。⁴ 关于当时派往伊犁的锡伯族人口总数还存在有不同的看法：肖夫、佟克力等人认为是 4030 人，⁵ 吴元丰、赵志强认为是 5050 人。⁶ 根据本人对肖夫所译《有关锡伯族西迁的几件历史档案译稿》的解读，发现这种数量上的差异主要在于：前者人数的总和包括防御 10 名，骁骑校 10 名，兵丁 1000 名，眷属 2255 人，途中出生婴儿 350 人，由原籍起程跟来者男女共计 405 人。而吴元丰、赵志强得出的人数与上述的差额在于眷属人口数量上，他们认为眷属人口数量为 3275 人。究竟哪一数字确切，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人在此暂且采用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说法，即 4030 人，这个数字约占当时锡伯族人口总数的 10%。这批锡伯族官兵前后分两批出发，第一批由满族镶黄旗盛京协领阿穆呼朗率领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四月十日出生，第二批则由满族熊岳城守尉格尔赛率领于当月十九日起程。⁷ 锡伯族官兵一路扶老携幼，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于次年七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分两批先后抵达伊犁，胜利完成了西迁的伟大壮举。

2.2 锡伯营的组建及其内部组织结构

锡伯族官兵在经过长途跋涉抵达伊犁时，清政府事先并没有指定其驻防之处。经过大臣爱隆阿、伊勒图、伊阿图等的奏请，遂将锡伯族官兵暂定驻扎在乌哈里克城（今新疆霍城县芦草沟乡）。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正月，锡伯族军民才迁到伊犁河南岸之巴图蒙柯巴克、绰豁罗拜兴迤西至豁吉格尔巴克一代耕种驻防，即今天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境内。在乌哈里克城修整期间，伊犁将军把锡伯族官兵按照索伦、察哈尔、厄鲁特之例，将其由原来的十个扎兰（队）编为六个牛录，总为一昂吉（营）。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伊犁将军阿桂奏请：

移驻伊犁之索伦、锡伯、察哈尔兵，按厄鲁特例，编设牛录。故不论旗份，曾以近二百户为一牛录，每部各设六牛录。今日齿日繁，一切差使等项又繁冗，如仍旧责成六牛录员管理，实属不足……锡伯、索伦、察哈尔等三部，亦同厄鲁特部，请增添两牛录，俱整编为八

¹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载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50 页。

² 《清高宗实录》卷 703，乾隆二十九年正月下丙子条，第 17 册，第 856 页。

³ 《清高宗实录》卷 704，乾隆二十九年正月上己未条，第 17 册，第 869 页。

⁴ 《清朝文献通考》卷 182，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6425—6426 页。

⁵ 肖夫：《略谈锡伯族的西迁及其历史贡献》，《西域史论丛》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18 页；佟克力：《新疆锡伯族古今人口概述》，《新疆历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

⁶ 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西迁概述》，《民族研究》1981 年第 2 期，第 24 页。

⁷ 军机处《满文月摺档》，载《新疆历史资料》第 13 辑，第 158 页。

牛录，以为八旗……¹

至此（1768年），锡伯营正式组建。锡伯营与其他三营一样也受伊犁将军的领导。

锡伯营八旗有正有镶，分左右两翼。其中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为左翼；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为右翼。营设领队大臣一人，总揽边防事务，驻扎惠远城；设立总管、副总管各一人，管理八旗事务，其办事机构称为“总管档房”，设于本营；设佐领八人，骁骑校八人，领催三十二人，委蓝翎侍卫四人，委笔帖二人。²道光年间，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前锋四十人，委前锋校四人，左右两翼防御各两人。³牛录是清代八旗组织的基本单位，亦是锡伯营最基本的单位。各牛录设有佐领、防御、骁骑校各一人，领催四人，负责管理牛录的军事、生产以及民间诉讼等一切事务，其办事机构称为旗下档房。

锡伯营官兵的俸禄钱粮实行与满营不同的形式，满营是有粮有银，而锡伯营则只发俸银，不发口粮，这就要求锡伯营官兵自耕自食，不能依靠政府，即所谓的“随缺地”制度。由于这项制度的实施，凡年满十八周岁的锡伯族青年都踊跃参加了一年一次的“伍克辛”（披甲）考试，选上则名利双收，选不上则成为“苏拉”（闲散），因而得不到俸地。入选的旗兵平时要经受非常严格的训练，所以在伊犁四营中素称“劲旅”，战斗力很强，因此每遇战事，都可以看到锡伯族军民奋勇当前。

锡伯营是集军事、行政、生产为一体的组织，与清代伊犁其他三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索伦营）相比，属于较强的一营，它在锡伯营人民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3 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西迁的锡伯族军民到达伊犁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展生产以满足本民族全体军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察布查尔南有乌孙山这个天然屏障，北有伊犁河自东而西横亘。在锡伯族西迁到伊犁河南岸之前，这里是准噶尔的属地。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该地变成荒野。但这里却不乏发展农业生产的先天条件：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又有绵绵不断的伊犁河为其提供充足的水源。

锡伯营八旗八佐领，分为八屯，镶黄、正白二旗驻谿吉格尔，正红旗驻巴图蒙克，引用泉水灌溉。镶白旗驻绰谿罗。正黄旗移驻塔什布拉客，镶红旗移驻厄尔格穆托罗海。正蓝旗移驻绰谿罗之东，镶蓝旗移驻绰谿罗之西，俱引用河水灌溉。⁴

清政府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命锡伯族军民在驻扎于伊犁河南岸的当年便开始耕种，籽种由清政府借予。

携眷锡伯兵一千户，达什达瓦厄鲁特兵五百余户，因伊等皆系去年秋收后抵达者，未及种田。本年应照奏准，赏给籽种，俾其种田……是故，锡伯、索伦、达什达瓦厄鲁特兵，视其情愿耕种，照前办之额，每昂吉得给五百石计，共需麦子七百石，青稞二百石、大麦一百五十石、黍一百八十五石、小米二百六十五石，由官仓拨给。此外，又据管带锡伯、索伦兵之领队大臣伊尔图、俄津转呈称：今锡伯、索伦兵习耕此处地亩，若只种官给五百石籽种，

¹ 军机处《满文月摺档》，载贺灵：《锡伯族百科全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3页。

² 《西陲总统事略》卷4，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第214页。

³ 《清宣宗实录》卷143，道光八年九月下丁巳条，第35册，第186页。

⁴ 《西陲要略》卷3，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113页。

尚未熟悉此处地亩情形，问或不能丰收，其食粮即致绝断。除官给额定籽种外，再尽力稍加多种，收成幸佳，其食不完者，于冬日饲养消瘦之马，卖而购置弥补之畜皆有裨益。即使收成平常，因所耕有余，无论如何不碍食粮。请由官借给锡伯兵青稞四百石……所借之粮，俟秋收后，照从前回子等所借之例，每石利息一斗，本脚一并交纳等情前来。¹

但是，由于耕种当年发生蝗虫灾害，所种之粮颗粒无收。因此，清政府命其“狩猎济食”。但这个办法并不能解决锡伯族军民的口粮问题，清政府只能发给口粮供其调剂。虽然察布查尔的北面是源源不断的伊犁河水，但要想利用它则必须开挖渠道引入锡伯族居住的地方。在当时，锡伯族军民所能引用的河水是准噶尔时期遗留下来的一条旧渠，这条渠在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中有明确的记载：

察布查尔山口东距雅玛图岭七十里，察布查尔水发焉。乾隆二十三年，副都统由屯追鄂哲特，带兵二百余名，昼夜兼行，三月二十一日，追及贼众于察布查尔河口之苏玛尔罕，令萨垒为左翼，奎苏德为右翼，由屯与侍卫玛拉锡居中，夺贼所属据山谷。追至特克斯河，杀贼二百余人。察布查尔水北流，经洋萨尔回庄东，灌其田，止不流。²

上面所说的“察布查尔水”就是今天的绰霍尔河。准噶尔时期就是从该河的一条支渠引水造田，因此后人将此渠称为“绰霍尔渠”。锡伯族军民迁到伊犁河南岸后就是利用这条渠开始发展农业生产的。绰霍尔渠一经疏通，两年内锡伯族军民便开垦耕地一万余亩，初步解决了锡伯营自身的口粮问题。由于粮食问题得到解决，边疆比较安宁，锡伯族人口数量也在几十年里稳步上升。据侯伟丽研究，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锡伯族人口已经发展到8000人左右，³ 这比西迁到伊犁时的4030人几乎翻了一番。由于人口数量的增长，原有的耕地面积已经不能满足锡伯族人民的生产发展需要，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迫在眉睫。原有的绰霍尔河水也不能满足更大耕地面积的灌溉需求，因此归根到底要解决的还是水源的问题。

嘉庆初，有部人图默特创议于察布查尔山口引水，自崖上凿渠，亦东西长二百余里。功费繁钜，部人嗟怨。图默特卒排众议，数年乃成。既浚新渠，辟田千顷，逐大丰殖，雄视诸部，郑白之沃，不足云也。图默特后以塔尔巴哈台领队致仕，部人顶而戴之，同于父兄。新渠东北，有积水潭，广数里，环潭皆回民田。松公筠因新渠成，以潭西南二面田二千亩界锡伯，锡伯之界遂东移。新渠自察布查尔山口经回人馆北，入新界，经积水潭南，二十余里，又经塔什布拉克南，溉锡伯正黄旗田。又西六十里，经察罕拜兴南，溉锡伯镶红旗田。又西五十余里，经巴图蒙柯北，溉锡伯正红旗田。又西十余里，至豁吉格尔北，溉锡伯镶黄、正白二旗田而止。

旧渠饮水十余里，至大桥，入新界。又西二十里，经锡伯馆南，其地与河北宁远城相直也。又西三十里，经锡伯镶白旗地，溉其田。田之东有枝渠，分旧渠水汇于河。又西三十余里，经巴图蒙柯军台南，其地与河北惠远城相直也。军台西数里，又经锡伯镶蓝旗地，溉其田而止。两渠相去十余里，新渠高于旧渠六七丈。新渠之南，并南山下，皆回民田。⁴

这段史料详细的记述了察布查尔大渠修建的经过和流经地区。该渠不仅使锡伯营八个旗

¹ 军机处《满文月摺档》，载贺灵：《锡伯族百科全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8页。

² 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30—231页。

³ 侯伟丽：《新疆锡伯族人口的发展及状况评析》，《西北史地》1995年第3期，第69页。

⁴ 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31—232页。

的耕地得以灌溉，而且还惠及到南山脚下的回民（维吾尔人）。经过锡伯族人民七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在嘉庆十三年（1808 年）修成了一条长二百多里的新渠，当时称“锡伯渠”或“锡伯新渠”，后来称为“察布查尔布哈”。¹ 滔滔不绝的伊犁河水流入察布查尔亘古荒原，很快就开垦出 78704 亩荒地。² 察布查尔大渠的凿成不仅给锡伯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徐松曾赞誉说虽关中地区的“郑白之沃，不足云也”。由此可见察布查尔大渠的价值所在。从此，锡伯族军民生活有了转机，到处村落相望，阡陌相连，更为重要的是察布查尔大渠至今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察布查尔大渠

锡伯族军民在解决了自身农业生产发展问题的同时，还为其它地区和人民的农业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嘉庆二十年（1815 年），为扩大伊犁河北岸的耕地面积，伊犁将军决定在惠远城和惠宁城之间修建阿齐乌苏大渠，后被称为皇渠，即今天的人民渠。当时任锡伯营总管的色布星额及其子带领部分锡伯族军民前来协助修建阿齐乌苏大渠，使该渠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顺利竣工。修成后的大渠可灌溉三棵树、红柳湾和阿勒卜斯十九万多亩的土地。为此，清政府还特意嘉奖色布星额为副都统衔，升其子为第五牛录的佐领。沙俄占领伊犁地区以后，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被迫离开伊犁，带领部分锡伯营官兵前往塔尔巴哈台投靠伊犁将军荣全。在塔尔巴哈台期间，他们与当地人民共同加固城堡，垦荒造田，积极筹备军粮，解决了塔尔巴哈台行营的军粮所需。后来喀尔莽阿又奉命带领一部分锡伯族军民前往博尔塔拉与察哈尔营军民一道垦地耕种，开挖了一条长约 50 里的“哈尔博户”大渠，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有清一代，锡伯族在伊犁地区这片土地上活动了近一个半世纪。从其踏入伊犁的第一天起直到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她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在伊犁地区经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锡伯营是伊犁四营中最富裕的旗营，同时也是其他诸营效仿的榜样。伊犁四营除了锡伯营外，还有索伦营、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其中索伦与锡伯一样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而另外二营则善于牧放。索伦营驻防在霍尔果斯河东岸一带，是四营中最贫弱的一营，

¹ “布哈”系满语，意即大渠。“察布查尔布哈”即今天的察布查尔大渠。

² 《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载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55 页。

在清代因天灾人祸，人口两次锐减，几乎到了灭绝的边缘。于是清政府先后两次从锡伯营中抽调近 1300 人补充给索伦营。察哈尔营驻守在博尔塔拉河流域，以牧为主，以农为辅。厄鲁特营在伊犁河南岸昭苏、特克斯一带屯牧，也是以牧为主，间有农耕。自清政府于嘉庆七年（1802 年）正式兴办旗屯开始，四营皆在旗屯之例。由于锡伯族在东北时就已熟练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故锡伯营的旗屯在四营中是最有成效的。据方英楷统计，锡伯营屯田 9 万亩，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各屯田 3200 亩，索伦营屯田最少，只有 2600 亩。¹ 可以看出，锡伯营屯田亩数是其它三营的总和，这充分说明了锡伯营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实力。此外，满营也是旗屯的重要组成部分。满营与伊犁四营不同，其所属的八旗兵丁全部由国家供养。但随着满营八旗兵人口的增长，供养八旗兵丁及其家眷便成了清政府的沉重负担。清政府鉴于锡伯营屯田的成功，遂令满营效仿。

嘉庆七年，奏准，查伊犁满洲兵丁六千名，驻防年久，户口孳生，家计贫乏，固当早为筹划，然亦无代为添办钱粮之理。近查锡伯部落官兵人丁，专意务农，虽年久户繁，而生计充裕。今伊犁食饷兵丁，边疆差务冲繁，虽于务农之暇，但内有革去马甲及前锋之闲散或身体稚弱，未能挑取当差，与其坐失空乏，不若令伊等，照锡伯之例耕种……²

在满营屯种之初，锡伯营还派去专员对其进行指导，帮助其兴修水利、垦荒造田，使满营共开垦耕地 6.4 万余亩。

锡伯营的屯田不仅满足了本营军民日常和战事粮食所需，更为重要的是减轻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

2.4 畜牧业及家庭副业的发展

锡伯族在迁徙以前世居大兴安岭、嫩江、松花江流域，是个渔猎民族，这种依靠渔猎为生的经济发展方式一直持续到 16 世纪末以前。从 17 世纪开始，随着锡伯族不断向经济发达的满、汉聚居区的迁徙，他们接受了先进的生产方式，逐渐由渔猎生活向农耕生活转变。

清朝统一新疆以后，为恢复和发展新疆地区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解决驻防军的军需及口粮，在新疆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开发活动。除了屯垦以外，兴办官牧厂也是一项主要的经济开发活动。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开始，先后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设立官牧厂。伊犁所设官牧厂有马、驼、牛、羊 4 个厂。

伊犁马驼牛羊，立厂畜牧有孳生之厂，有备差之厂。自乾隆二十五年立孳生马厂，二十六年立孳生羊厂，二十七年立孳生驼厂，孳生牛厂。³

牧厂设立之初，牲畜除了部分由回子牧放外，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也一并放养。当时锡伯营总管档房和旗下档房都设有官牧厂，牧放马、牛、羊等牲畜以备官兵当差骑用和解决官兵的食肉问题。但是锡伯营由于不善牧放、屯垦戍边任务繁重等多种原因，牧厂经营状况并不乐观。乾隆三十年（1765 年），伊犁将军明瑞奏准，将锡伯营牧放孳生马匹全行撤出，交与上三旗厄鲁特牧放。锡伯营孳生马厂仅维持一年被迫停止。嘉庆三年（1798 年），又将锡伯营牧放孳生牛只全行撤出，分交察哈尔、厄鲁特、回子牧放。与此同时，锡伯族人民的家庭副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嘉庆十七（1812 年）年，军机大臣

¹ 方英楷：《新疆屯垦史》（下），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 年，第 649 页。

²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16，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7648 页。

³ 《钦定新疆识略》卷 10，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 年，第 1025 页。

松筠等为解决满营生计拮据时具折奏称：

按照驻防锡伯之制，养鸡畜豚，其于生计大有裨益。¹

这为其他诸营家庭副业的发展做出了表率。

从以上不难看出锡伯族军民在伊犁的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屯垦史，这在伊犁的经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为现代伊犁地区农业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¹ 《钦定新疆识略》卷 6，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 年，第 852 页。

第三章 锡伯族移民与清代西北边疆的巩固

3.1 清代新疆的内外形势

锡伯族作为清代边疆少数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命运与清朝政府相关政策乃至清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强盛时,则人民安居乐业,国家衰退时,则民乱而强敌入侵。因此,西迁新疆的这部分锡伯族人民与清政府共进退,为维护国家内部安定,保卫祖国边疆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清朝前期,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国力强盛,经几代帝王的努力,新疆已经划入中国的版图。清政府把新疆的防御重心放在天山北部。对此,清政府解释说:

伊犁向为准夷(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腹地,加意经画,故稿事颇修。今归我版图,若不驻兵屯田,则相近之哈萨克、布鲁特等乘机游牧,又烦驱逐。¹

当时官方编修,并经乾隆帝钦定的《西域图志》一书对此说:

四部素习农功,城村络绎。视准疆数千里,土旷人稀,形势迥别。自全部输诚内属,设立驿站卡伦之外。其各城所在,固无事多兵驻守矣。²

由此可见,清政府把治理新疆的重心放在天山以北地区,与此前厄鲁特蒙古诸部长期据守这一地区并与清政府对抗有着密切的关联。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时的清政府已经认识到中国西北边疆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把如何维护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定和领土完整作为新疆驻守军队的首要任务。随着西北边疆战略地位的显著提高,清政府制定了西北的边防政策,如设置伊犁将军,派驻重兵驻军西北,设立巡边制度,设置卡伦,兴建台站等。这一系列举措可以有效加强对西北边疆的管理与安全防御。清政府的这一系列举措都与锡伯族的西迁及迁徙后的活动密切相关。

乾隆中期以后,清朝全盛的局面开始衰落。财政亏损,朝政风气败坏,各种弊端开始暴露出来。当时的新疆形势愈发严峻,具体表现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加重,国防松弛。以伊犁将军为首的各级官员,腐化堕落,贪污成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加剧,使得新疆各族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和卓后裔借助外力发动的叛乱和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的发生。清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八年(1820-1828年),在新疆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发生了历时八年的“张格尔之乱”。在这期间,锡伯族兵丁经常被派往南疆参加平叛战役,并且为生擒获张格尔立有汗马功劳。叛乱伊始,锡伯营数百名官兵作为一支重要力量,也被清政府掉去戡乱。他们同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各营官兵及由内地调来的平叛大军一道同张格尔叛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历时八年的“张格尔之乱”终于在锡伯族等新疆各族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被剿灭。“张格尔之乱”平定后,南疆得到了短暂的安定局面。此时,清政府放松了对南疆的军事防御,陆续撤回了在喀什噶尔换防的锡伯兵。但好景不长,浩罕又利用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再图进取南疆。在该次叛乱中,锡伯族官兵前后几次被派往阿克苏、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围剿敌军。最终,玉素甫之乱也被平定,锡伯族官兵又一次为保卫南疆做出了贡献。此后,西北边疆维系了十七年相对稳定的局面。和卓后裔前两次叛乱的失败并没有打破其要统治南疆的梦想,在浩罕的支持下,和卓后裔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

¹ 《清高宗实录》卷 606,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上甲申条, 第 16 册, 第 807 页。

² 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卷 31,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第 437 页。

年)和咸丰七年(1857年)两次在南疆制造了“七和卓之乱”和“倭里罕之乱”。在平定这两次叛乱过程中,有多名锡伯族官兵因功授奖、擢升。从和卓后裔一次又一次的叛乱可以看出,其性质属于受外国势力支持的旨在分裂祖国的分裂活动,其目的是建立独立王国,其破坏性是巨大的,给南疆的维吾尔等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锡伯族官兵作为清政府派往新疆驻防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每一次平叛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保卫新疆南部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付出了巨大代价。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西方列强瓜分的地盘。此时的新疆也未能幸免于难,其中又以沙俄的侵略最为嚣张。道光二十九年至光绪十年(1850—1884年),沙俄侵略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巴尔喀什湖与伊犁地区。沙俄在侵占伊犁期间,为迫使当地人民投降,把沙俄在哈萨克及中亚地区实行的殖民统治强加于伊犁人民。如驻扎大批军队,营造据点,军事演习,向当地人民勒索钱粮、索要户口册籍等。这一系列无耻行径遭到包括锡伯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坚决抵制。新疆各族人民经过十余年的艰苦斗争,最终将伊犁从沙俄手中收回,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纵观清朝新疆的形势,可以看出,在清朝的前期,由于国力强盛,新疆的各项政治制度比较完善,贯彻落实情况比较好,新疆的内外形势比较安定。到了乾隆中后期,国力日衰,纲纪废弛,新疆地区开始出现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别有用心反动势力欲建立独立王国,进而与国外势力相勾结。而窥视西北地区已久的西方列强则利用这一时机,对新疆进行了疯狂的侵占与掠夺,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造成中国严重的边疆危机。在此国难危急关头,新疆各族人民举起反压迫、反侵略的大旗,在清政府的组织下,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和西方列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西迁新疆的锡伯族军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常被抽调到各地镇压内乱分子,抵抗外来侵略者,为保卫祖国西北边疆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3.2 锡伯营戍边的具体内容

自乾隆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统一天山南北以后,逐步加强了伊犁地区的防务,从全国各地抽调兵丁驻守屯田,东北地区的锡伯族被抽调到伊犁驻防屯田正是出于战略意义上的考虑。驻守卡伦¹与换防台站是锡伯族军民必须且长期执行的一项军事任务。另外,每遇战事,他们又首当其冲被抽调到各地参战,在强敌入侵时他们更是奋勇当先,毫不畏惧。

3.2.1 驻守卡伦、换防台站

清廷统一天山南北后,在“岩疆要隘设卡伦以资捍卫……卡伦则领以前锋校、骁骑校,而以侍卫统之,其驻兵多寡,则视其地大小、简要为差。”²在边疆地区靠近边境的地方设立卡伦,定期巡查是清代边防的一项重要措施。伊犁将军松筠曾明确说过:

新疆南北各城皆设卡伦,而伊犁为最多。伊犁境内东北则有察哈尔,西北则有索伦,西南则有锡伯,自西南自东南则有厄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其禁在于私越;又有铜场、铅场、屯工、船工,安置发遣罪人,其禁在于遁逃;至于境外,自北而西则有哈萨克;自西而南则有布鲁特,壤界毗连,其禁在于盗窃。故设卡伦,派兵巡守。³

¹ 卡伦即哨卡。

² (清)傅恒奉敕撰;(清)于敏中等,(清)刘统勋奉敕撰:《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31,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44—645页。

³ 《钦定新疆识略》卷11,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第1059—1060页。

这些卡伦的职能是管理游牧、监督贸易稽查逃人，管理重要山场、渡口、通道等禁区，防止外敌入侵等。由此可见，设置卡伦对内、对外都是十分有益的。这些卡伦分布在山川要隘和交通要道之处，其种类可分为三种：一是常设卡伦，常年有军队驻守；二是移设卡伦，地点不固定，随季节变化而移动；三是添撤卡伦，在边界附近，不常驻兵。

锡伯营负责驻守的卡伦数目史书记载不一。《新疆识略》和《朔方备乘》两书记载锡伯营驻守的卡伦有 18 座，¹ 而《西陲总统事略》中记载的数目为 17 座。² 这主要是由于对卡伦种类具体划分不一造成的。根据《新疆识略》的记载，锡伯营领队大臣负责驻守的卡伦具体如下表：

卡伦名称	类型	位置	兵员情况	备注
固尔班托海卡伦	常设卡伦	惠远城西南七十里，西至安达拉卡伦七十里	锡伯营领催一员，兵六名。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由锡伯营分管，同治初年废，今称依兰木旦。
安达拉卡伦	常设卡伦	西至沙巴尔托海卡伦七十里	锡伯营领催一员，兵六名。	光绪八年（1882 年）后被划入俄境。
大桥卡伦	常设卡伦	惠远城西南一百一十里	锡伯营领催一名，兵四名。	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由锡伯营分管，同治初年废。
春稽卡伦	常设卡伦	西南至塔木哈卡伦八十里	满营官一员，兵二名，锡伯营兵三名，厄鲁特营兵十五名。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由锡伯营分管，光绪八年（1882 年）后被划入俄境。
沙巴尔托海卡伦	移设卡伦	西至托里卡伦七十里	锡伯营官一员，兵十名，厄鲁特营兵十名。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由锡伯营分管，光绪八年（1882 年）后被划入俄境。春季设，秋季移至察罕托海。
托里卡伦	移设卡伦	西至玛哈沁布拉克卡伦五十里	锡伯营空蓝翎一员，兵十名，厄鲁特营兵十名。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由锡伯营分管，光绪八年（1882 年）后被划入俄境。春季设，夏季移至额木纳察罕乌苏，秋季移至托额图。
玛哈沁布拉克卡伦	移设卡伦	西至春稽卡伦八十里	锡伯营官一员，兵十名，厄鲁特营兵十名。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由锡伯营分管，光绪八年（1882 年）后被划入俄境。春季设，夏季移至辉图察罕，秋季移至额哩音莫多。

¹ 《钦定新疆识略》卷 11，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 年，第 1063-1065 页。《朔方备乘》卷 10，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 253-254 页。

² 《西陲总统事略》卷 9，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 年，第 176 页。

卡伦名称	类型	位置	兵员情况	备注
塔木哈卡伦	移设卡伦	东北至春稽卡伦九十里	锡伯营空蓝翎一员，兵十名，厄鲁特营官一员，兵十名。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由锡伯营分管，光绪八年（1882 年）后被划入俄境。春季设，秋季移至察林河口。
头勒克卡伦	移设卡伦	东南至春稽卡伦九十里，西南至察林河口卡伦四十里	厄鲁特营官一员，兵十五名，锡伯营兵十名。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由锡伯营分管，光绪八年（1882 年）后被划入俄境。秋季设，春季移至厄鲁特营的巴噶塔木哈，夏季移至塔木哈色沁。
额木纳察罕乌苏卡伦	移设卡伦	西至辉图察罕乌苏卡伦五十里	无定额。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由锡伯营分管，光绪八年（1882 年）后被划入俄境。夏季由托里移设。
辉图察罕乌苏卡伦	移设卡伦	西至塔木哈卡伦六十里	无定额。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由锡伯营分管，光绪八年（1882 年）后被划入俄境。夏季由玛哈沁布拉克移设。
察罕托海卡伦	移设卡伦	西南至沙巴尔托海卡伦八十里，西北至托额图卡伦八十里	无定额。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由锡伯营分管，光绪八年（1882 年）后被划入俄境。秋季由沙巴尔托海移设。
额哩音莫多卡伦	移设卡伦	西南至头勒克卡伦六十里	无定额。	秋季由辉图察罕乌苏移设。
察林河口卡伦	移设卡伦	东至春稽卡伦四十里	锡伯营空蓝翎一员，兵十名，厄鲁特营官一员，兵十名。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由锡伯营分管，光绪八年（1882 年）后被划入俄境。秋季由塔木哈移设。
托额（赖）图卡伦	移设卡伦	西至沙喇托罗海卡伦八十里	无定额。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由锡伯营分管，光绪初年废。秋季由额木纳察罕乌苏移设。
塔木哈色沁卡伦	移设卡伦	在塔木哈卡伦之西南河口安设	无定额。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由锡伯营分管，光绪八年（1882 年）后被划入俄境。夏季由巴噶塔木哈移设。
沙喇托罗海卡伦	添撤卡伦	西南至额哩音莫多卡伦一百里	锡伯营官一员，兵十五名，厄鲁特营兵十名。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由锡伯营分管，光绪八年（1882 年）后被划入俄境。秋季添，冬季撤。
乌里雅苏图卡伦	添撤卡伦	东北至沙巴尔托海卡伦八十里	锡伯营官一员，兵十名，厄鲁特营兵十名。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由锡伯营分管，光绪八年（1882 年）后被划入俄境。夏季添，秋季撤。

此外,锡伯营官兵还需与索伦、达斡尔兵丁一起,驻守霍尔果斯河一带的霍尔果斯安达拉、齐齐罕安达拉、霍尔果斯、齐齐罕、博罗呼济尔、崆郭罗鄂、辉火、河岸和奎屯色沁等十个卡伦。由于各领队大臣管辖卡伦大多数在光绪八年(1882年)后被划入俄境,故清政府又在沿边射卡伦三十处,锡伯营设卡四处:塔奇勒哈卡,距阿里干谷卡三十里;干察罕莫敦卡,距塔奇勒哈卡四十里;三棵树卡,距干察罕莫敦卡六十里;头湖卡,距三棵树卡六十里。此外,锡伯营还与厄鲁特营共同驻守阿里干谷卡。¹

清政府对卡伦的巡查也有明确的规定:

伊犁沿边大小卡伦七十余座,周围地逾数千里,各卡相离数十里至百里之遥。每卡仅设弁兵十余名至三十余名不等。惟按月周巡,可期声势联络,其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四营,每月派总管副总管佐领等官一员,各带本营兵丁三十名,于该管卡伦挨次行查。至各营交界会哨,其中隔大山、无路可通及所管各卡伦隶于境内者,均毋须巡查会哨,统计各营每月各派兵会哨一次,如该官兵巡见哈萨克等私越开齐,即当追逐惩创,惟不准追出卡外,希冀邀功。至冬末春初,冰雪封山,收入卡伦时,即行裁撤,仍令本营卡伦官兵,自行会查,以后按年照办。所有出差官员兵丁,各令按月轮派,仍令各领队督率巡防,认真查察,如有会哨误期及虚报巡查等弊,查明参办。²

就是因为有如此严格的规定,才使得卡伦制度得以完善贯彻,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锡伯营除了驻守卡伦以外,换防台站也是一项重要的戍边任务。台站又称军台,其功能与卡伦有一定的区别。清代换防制度要求:换防兵不携眷,每二年轮换,一年换一半。锡伯营主要负责的是去战略地位重要的塔尔巴哈台台站和南疆的喀什噶尔台站换防。

换防塔尔巴哈台约始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最初,满、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各营共派官兵1200名,其中满营600名,锡伯营100名,索伦营50名,厄鲁特营250名,察哈尔200名。³随着塔尔巴哈台地区驻牧人口日渐增多,部分土尔扈特人安置于此,为加强该地区的军事实力,伊犁将军舒赫德奏请增派锡伯等营官兵赴塔尔巴哈台换防。清政府同意了增调人员的请求。嘉庆年间,经伊犁将军松筠的奏请,又往该地区添派了兵丁。至此,换防塔尔巴哈台的锡伯营官兵人数达到近二百人。换防塔尔巴哈台制度一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后,由于民族起义和沙俄等西方列强的入侵而遭到破坏,因而被迫停止执行。

喀什噶尔属南疆重镇,又是南疆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清政府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便制定了派遣各营官兵到此换防的制度。对此,伊犁将军伊勒图奏请曰:

窃查,前经奴才与舒赫德会奏,各回城驻防兵,亦照塔尔巴哈之例,两年一换。又,现在回城驻防西安兵六百名,其各家眷将于明年四月、五月抵达,若兵丁自身在此,便于料理各自生计。故先由伊犁派兵更换此项六百兵,其余由伊犁派出满洲兵二百名、察哈尔兵一百名,明年秋季再派兵更换等因,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嗣后各回城驻防兵,又由伊犁派遣,相应一切事项,亦照塔尔巴哈台换防之例办理。查得,伊犁派往塔尔巴哈台换防各营、部官兵,向无一切整装之项,亦不得给官蓄,皆乘私马前往。每一百名兵编为一甲喇,由佐

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新疆乡土志稿》,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38页。

² 《清宣宗实录》卷254,道光十四年七月癸酉条,第36册,第862页。

³ 贺灵、佟克力:《历史·民族·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领、防御内委任参领一员统领，又派骁骑校一员协助。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部因官员少，由实职官员内委任参领一员统领，并由领催内拣选优良者一名，委任骁骑校，协助统兵。再由协领、总管、副总管、佐领等员内委任营长一员，总统诸事，所有委官，仍按各该原取得盐菜银。嗣后，派往回城换防官兵，亦应一体办理，故派往换班之兵，即照此例，每兵百名为一甲喇；每满洲甲喇，由佐领、防御内委任参领一员统领，又派骁骑校一员协助；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部派职官一员，委任参领，俾其统兵，并由领催内拣选优良者一名，委任骁骑校，协助统兵；统兵所需营长，酌量兵数，于协领、总管以下，佐领以上官员内，拣选善于管束者一员，委任营长，总统诸事。官兵皆免整装之项，仍乘私马。所有委官，亦按各该原取得给盐菜银，委职不补。嗣后，每当换班，均照此办理。¹

得到批准之后，伊犁将军遂派遣锡伯等营官兵换防喀什噶尔。18世纪80年代之前，喀什噶尔有锡伯、索伦官兵各96名。嘉庆三年（1798年），清政府又决定每年派往喀什噶尔300名换防兵，由锡伯、索伦平半更换。至嘉庆八年（1803年），由于喀什噶尔地区比较安定，故将300名锡伯、索伦兵全部撤回伊犁。十余年的平静过后，由于当地形势的变化，又恢复了换防制度。换防喀什噶尔制度一直持续到同治初年全疆农民起义后停止换防。

除上述两项长期、固定戍边任务外，巡查布鲁特和哈萨克边界也是锡伯营的一项职责。每年秋季，伊犁将军派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官兵三百余名巡查哈萨克边界，隔一年的春季再巡查布鲁特边界。

“每年秋季分巡查哈萨克边界一次，两满营应派……锡伯营官一员，兵三十名……”²

“查布鲁特边界向来隔一二年不等派各营官十员、兵三百名巡查一次。于道光八年仍照嘉庆二十一年之例，新设换防喀什噶尔官兵。派……锡伯营官一员，兵二十名……”³

3.2.2 维护内部安定与抵御外侮

有清一代，锡伯族为清朝的统一以及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西迁之后的锡伯族作为伊犁驻兵中较重要的部分，在平内御外斗争中曾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在平定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八年（1820-1828年）的“张格尔之乱”，道光十年（1830年）的“玉素甫和卓之乱”，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七和卓之乱”，咸丰七年（1857年）的“倭里罕之乱”，以及抵御沙俄侵略扩张等斗争中，锡伯族军民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冲锋陷阵，不避血刃，英勇顽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清代西北边疆的历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八年（1820—1828年），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发生了历时八年的武装叛乱，称“张格尔之乱”或“西四城叛乱”。叛乱伊始，喀什噶尔参战大臣派领队大臣色普征额率领在喀什噶尔换防的锡伯、索伦官兵杀匪50余人，活捉100余人，张格尔率200余匪逃出国境。道光四年（1824年），张格尔又纠集百名叛匪，从阿赖岭入境，抢劫乌鲁克卡伦，又被锡伯、索伦官兵击溃。次年十月，张格尔率军大举进犯喀什噶尔，锡伯、索伦等官兵前去堵截，但由于用兵不当等原因造成锡伯、索伦官兵阵亡35人，清军溃败。同年底，清政府调派锡伯、索伦、满、厄鲁特、察哈尔营官兵各100名赶赴喀什噶尔剿匪。道光六年（1826年）张格尔第三次作乱时，庆祥指挥千余名锡伯等

¹ 军机处《满文月摺档》，载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8—149页。

² 《伊犁文档汇钞》，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346页。

³ 《伊犁文档汇钞》，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344页。

族官兵平叛，但此次战役终因敌强我弱而使喀什噶尔陷落，锡伯、满、索伦等数百名官兵牺牲。随后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三城相继陷落。在西四城陷落之前，清政府调集各省官兵 3.6 万人，又增派锡伯、索伦、满等族数百人作为预备官兵随时调用。道光六年（1826 年），派往阿克苏的锡伯、索伦、满等营官兵在浑巴什河与敌军交锋，歼敌 1000 多人，战役最终取得胜利。在这次战役中，锡伯官兵表现英勇，并有数十名官兵为此献出了生命。道光八年（1828 年），败走的张格尔仍不死心，又纠集五百多人，煽动布鲁特人在年关之际潜入卡伦。锡伯马甲色布星额探知消息，及时向伊犁将军长龄汇报，锡伯族官兵配合各路官兵追捕张格尔。在额尔铁盖山，锡伯马甲讷松阿、舒兴阿与绿营的胡超、段永福等活捉了张格尔。之后，道光帝对平定张格尔叛乱有功的锡伯营官员给予奖赏。

前据长龄等红旗奏报所有出卡擒逆最为出力之副将胡超、都司段永福，马甲讷松阿、舒兴阿、马兵杨发、田大武及贝子伊萨克，业经联渥沛殊恩，较长龄等所保尤为优厚，无庸再议。其头等出力回兵，该将军等分别酌赏银两，并将官兵出力相等者，酌给六、七品顶带，所办俱是……伊犁锡伯马甲色布星额、沙精阿、布扬阿，俱著以骁骑校遇缺即补，赏戴花翎……锡伯骁骑校岳兴阿……俱著赏戴花翎……锡伯领催倭星额、马甲乌林泰、穆伦泰、额勒金布、色明阿、达尔库、讷恩得布、赉音布、哈林保、额勒金泰、玛琳阿、花良阿、塔克伸泰、德里布、叶铿额、塔克什布、富得布、诺木钦、特克星阿、讷色布、和绷额、哈尔通阿、吉勒通阿、富勒东阿……俱著赏戴蓝翎……又上年九月内，该将军等保奏续行查出打仗出力及阿赖剿贼奋勇之官兵八十一人，内除锡伯总管额尔古伦前已赏加副都统衔……外，所有……锡伯马甲布扬阿、巴克塔布、苏伦布、讷愣额、伊尔根布、额凌泰……俱著以升之缺尽先升用。¹

平定“张格尔之乱”立功锡伯官兵表

姓名	官职	奖励
额尔古论	锡伯营总管	著赏加副都统衔
岳兴阿	骁骑校	赏戴军功花翎
倭星额	领催	赏戴军功蓝翎
讷松阿	马甲	赐“侃勇巴图鲁”称号
舒兴阿	马甲	赏戴花翎，赐“绍勇巴图鲁”称号
色布星额	马甲	赏戴军功花翎
沙精阿	马甲	赏戴军功花翎
布扬阿	马甲	赏戴军功花翎
乌林泰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穆伦泰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额勒金布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色明阿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达尔库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讷恩得布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赉音布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¹ 宫中《汉文上谕档》，载贺灵：《锡伯族百科全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44 页。

姓名	官职	奖励
叶铿额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塔克什布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富得布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诺木钦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特克星阿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讷色布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和绷额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哈尔通阿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吉勒通阿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富勒东阿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塔克申泰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德里布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额勒金泰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玛琳阿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花良阿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哈林保	马甲	赏戴军功蓝翎

道光十年（1830 年），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在浩罕支持下侵入南疆作乱。在援兵到来之前，伊犁将军命喀什噶尔领队大臣额尔古伦率锡伯、索伦换防兵镇压。同时又增派锡伯、索伦、满等营官兵数千人赴阿克苏。同年底，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锡伯等官兵在伊犁、乌鲁木齐等地援兵配合下将玉素甫逆匪叛乱平定。同样，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的“七和卓之乱”和咸丰七年（1857 年）的“倭里罕之乱”中，锡伯营官兵又是首当其冲、冲锋陷阵，荣立战功。如在平定“七和卓之乱”时，一次：

布鲁特贼匪攻扑卡伦，经官兵奋力攻击，箭射黑衣贼匪落马，得获胜仗，当降旨飭令查明射贼者何人，兹据赛什雅勒泰等会同查明，奏称此次打仗箭射穿黑衣贼目落马之人，实系锡伯营甲兵塔清阿，该甲兵奋勇争先，射毙头目，贼众立即溃散，尚属勇敢可嘉。塔清阿，著赏给骁骑校，以示鼓励。¹

另据军机处《满文月摺档》个人“履历清单”的记载，其中有为数不少的锡伯营官兵在“七和卓之乱”中因功被清政府嘉奖、提升：

拟陪萨凌阿之锡伯部镶黄旗佐领世袭云骑尉诺齐台巴图鲁博勒果苏……二十七年，出征喀什噶尔地方，与敌打仗不避刀刃，经军务参战大臣奕山保奏，赐博勒果苏诺齐台巴图鲁名号。²

拟补佐领递出防御缺，拟正之锡伯部镶蓝旗台费音佐领下五品顶戴骁骑校穆呼赖，食俸饷二十八年。二十七年，喀什噶尔出征一次，打仗三次，因格外奋勉，经军务大臣奕山保奏，奉旨：俟出防御缺后，穆呼赖尽先升补，先换顶戴。³

¹ 《清宣宗实录》卷 436，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乙巳条，第 39 册，第 459 页。

² 军机处《满文月摺档》，载贺灵：《锡伯族百科全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54—455 页。

³ 军机处《满文月摺档》，载贺灵：《锡伯族百科全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54

拟补防御递出骁骑校缺,拟正之锡伯部镶红旗纳松阿佐领下军功蓝翎额外骁骑校委领催舒常阿……二十七年,喀什噶尔出征一次,与敌打仗右手被刺,受二等伤,经军务参战大臣奕山保奏,赏银三十两,命为额外骁骑校之处业已咨部。¹

拟陪舒常阿之锡伯部镶红旗希布常阿佐领下额外骁骑校年满委笔帖式德布西……二十七年,喀什噶尔出征一次,打仗三次,因格外奋勉,经军务参战大臣奕山咨部授为额外骁骑校。²

从如此之多锡伯营官员被赐赏授封也可以看出锡伯族官兵在平定张格尔等一系列剿匪战役中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民族牺牲。

由于清朝后期国力日衰,中亚浩罕小国尚且都敢侵犯新疆,北方强邻沙俄就更加肆无忌惮地不断侵犯我国西部领土,趁伊犁动乱之机加快了对伊犁地区的蚕食步伐。同治二年(1863年)夏,沙俄军队数次向索伦营驻守的博罗呼吉尔卡伦开炮,当即遭到当地索伦等官兵的反击。伊犁将军随后派遣锡伯等营官兵数百人堵截,打退了沙俄军的滋扰。在沙俄占领了伊犁之后,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锡伯等营勒索钱粮、拷打旗人。

对将锡伯营防御吉尔噶布,委官德本泰鞭打,将署领队喀尔 阿看押凌逼,纵各营官兵等矢志未移,而日日凌虐,其何以堪。³

同治十二年三月丙申(1873年4月14日),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奏:署锡伯营领队,总管喀尔莽阿差人斋禀,先后来塔。据称伊犁俄人现有一千余众,尚无动静,日向索伦、锡伯、蒙古、汉人等勒索银两甚紧,各营牲、粮均已变价给交,刻下万分窘苦,恳乞接济。⁴

沙俄的暴行激起了锡伯族人民同当地其他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而且还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锡伯族英雄人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锡伯族营总管喀尔莽阿。沙俄出兵强占伊犁,清政府命伊犁将军荣全赴伊犁与沙俄交涉,却遭到沙俄的阻拦,于是在塔城建立行营。署理领队大臣、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身处逆境,却不断派人与塔城行营联系。沙俄对喀尔莽阿软硬兼施,但他毫不畏惧,后在沙俄逼迫之下离开了故乡伊犁前往塔城。到了塔城后,他奉命带领一部分锡伯官兵到博尔塔拉与察哈尔营军民一道开垦农田,聚积粮草,为左宗棠收复新疆,最终赶走沙俄侵略者奠定了基础。此外,每遇战事,锡伯营军民都会首当其冲被抽调到各地参战。

诗人徐迟曾这样写道:“二百多年来这个人数比较少的锡伯族,就敢顶、敢撞,敢于斗争,不惜牺牲,无所畏惧。”“可就这坚强的察布查尔锡伯族二百多年来忠诚信守着屯田戍边的宿愿,毫不动摇、始终不渝。”这绝不是虚无缥缈的赞美之词,而是勤劳勇敢的锡伯族人民的真实写照。

—455 页。

¹ 军机处《满文月摺档》,载贺灵:《锡伯族百科全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4—455页。

² 同上。

³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6,第38页。

⁴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9,第22页。

第四章 锡伯族移民与其语言文字及教育的发展

清朝初年,锡伯族军民被编入满洲八旗之后,便全面接受和使用作为“国语”的满语满文。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部分军民西迁至新疆伊犁,锡伯族的满语使用环境发生了变化,留居东北的锡伯族开始接受汉语、汉文,而西迁的锡伯族则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将满语、满文完整的继承下来。学习汉语、汉文对于清代新疆锡伯族来说显得并不容易,由于受到种种限制,直到清朝末年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汉语文学习。

4.1 重视文化教育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锡伯族的西迁揭开了锡伯族文化教育史的新篇章。在到伊犁的第二年(乾隆三十一年),伊犁将军明瑞便以伊犁八旗随营子弟不能家自为学为由,奏请乾隆帝每旗各设清书学房一所。¹因此,锡伯营也照例设书学房一所,教习二人,分司教学、教弓。学生无定额,一般在16—24名不等,年终由伊犁将军派官员考核。同时,在惠远城也设一义学,其中也有数名锡伯族子弟学习。其中成绩优异者被授予旗营笔帖式等职,或在“旗下档房”做文职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官办的义学招收的人数有限,而且也是为培养选拔管理人才而设立的,远不能满足广大普通锡伯族民众的求学要求。因此,私塾教育便在锡伯营应运而生。到同治年间,官办义学和私塾教育在锡伯营中已有近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使满语、满文在西迁的锡伯族人民中深深地扎了根,同时有许多满族作品相继问世,不少汉文古典名著也被翻译成满文。这充分说明了满语、满文在锡伯族人民群众中的广泛使用。

由于新疆爆发农民起义和沙俄对伊犁长达十年的侵占,使得锡伯族的教育事业一度受阻中断,直到沙俄退出伊犁,清政府在伊犁地区的军事、政治统治恢复,锡伯营才得以重新恢复各项机能。此时的锡伯营领队大臣色布希贤不仅努力带领锡伯族军民恢复农业、发展生产,更重要的是他在锡伯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史上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西迁锡伯族的学校教育也是从这时正式开始的。尽管在此之前,有了官办义学和私塾教育,但能够接受文化教育的人仍较少,且教育内容单一。光绪八年(1882年),清军收复伊犁后,伊犁将军金顺给各营官兵补发了资助款。这些资助款的发放是为了帮助各营恢复生产发展用的,但色布希贤毅然决定从这笔资助款中拨出一部分用来发展本民族的教育事业,这在当时那种艰难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得的,而且是英明之举。随后,经与各旗官员的协商,在锡伯营八旗每个牛录各设义学一所,招收对象不再单纯是富家子弟,凡锡伯族学龄儿童皆可接受教育。教学内容也非常广泛,包括满文、圣谕广训、八旗戒训和译成满文之《诗经》、《三字经》、《千字文》、“四书”等。从教学内容来看,满语、满文仍是教学的主要内容,另外增添了德育教育的内容,如《三字经》、《千字文》、“四书”等等。

“念说”是在锡伯族民间流传的一种带音调的说书形式。清朝政府为扩大满语、满文在各旗的影响和使用范围,从康熙年间开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编辑各类教科书、语言教材,并翻译大量汉文古籍著作和佛教经典等,至乾隆年间,各类满文文化读物被大量推出,丰富了满族人的文化需要。这些满文书籍也广泛流入新疆锡伯营中,因此,形成了锡伯族独具特色的“念说”文化。通过“念说”活动,使锡伯族军民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满语,而且还使普通老百姓吸收了各类文化信息,丰富了业余生活。听众有时还会将自己听到的转

¹ 《钦定新疆识略》卷4,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第639页。

述给其他群众,因此,“念说”的文化传播意义十分显著。

纵观整个清代新疆锡伯族的文化教育状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经济、政治各方面因素的制约,锡伯族在迁至伊犁的初期受正规教育的人数较少,其中以官宦子弟居多,至清朝末期,锡伯族受教育的人数普遍增多,而且学生来源也不再局限于官宦子弟;②教育内容主要为八旗训诫,伦理道德教育也是教育重点;③在清代末期出现了正规的锡伯族学校教育,并且开锡伯族双语教育之先河。这些教育举措在今天看来有诸多欠缺之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为锡伯族继承、完善中国宝贵文化遗产——满语、满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2 锡伯族移民后满语文的使用及社会因素

锡伯族在西迁之前就已全面掌握了满语、满文,这与当时的统治民族——满族推行“国语骑射”和锡伯族自身具备的学习语言的先天条件优势有很大关系。而此时满族军民却逐步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改用汉语。这一历史事实在盛京将军恒禄的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下得到证实:乾隆三十六年七月该将军“前往盖州、熊岳、复州、南金州、旅顺水师营……试得官兵之满洲话,锡伯人等皆能说满洲话,其余人等虽较前稍有长进,但不会、不懂者犹多。”¹

至清末,居住东北的满、锡伯族等民族已完全废弃了满语、满文。试想,如果没有锡伯族的西迁,现在就没有一个民族能通晓满语、满文了。

语言、文字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进行交际的工具。有清一代,满语文是清王朝的国语、国文,曾辉煌一时,但随着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满语文也随之变得暗淡失色,满族不再使用满语、满文了。而在清代被编入满洲八旗的锡伯族,却逐渐学会了满语文,并完整的继承了满语文。随着部分锡伯族被派往伊犁戍边,他们也将满语、满文带到了这块土地上,并长期使用。在历史上,曾有不少民族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及政治、军事、人文环境的变化,放弃使用本民族固有的语言文字而改用其它民族的。但西迁的锡伯族在众多的差异、变化之下,不但没有放弃使用满语、满文,而且还使得它得以继承和发展,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锡伯族具备学习满语文的先天优势。锡伯族固有的语言与满语有诸多的相似之处,使得锡伯族能够较快地掌握满语文,并为日后迁居新疆保存满语文奠定了基础。佟克力认为清初锡伯族使用的语言与满语极为相似,因此语言的传承性特点决定了其短时间内掌握了满语。余图肯认为锡伯语与古鲜卑语有某种血肉联系,而鲜卑语又与女真语有很多相似之处,从而推断出锡伯语与满语有天然的联系。²

其次,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为锡伯族继承满语、满文提供了重要保障。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它虽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它能够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西迁到新疆的锡伯族使用语言、文字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却能够继续保留满语、满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察布查尔独特的地理环境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延缓的作用。察布查尔位于新疆乌孙山之北,伊犁河以南河谷盆地。在其北面有新疆最大的河流——伊犁河,当时人们若想过河只能靠渡船或骑羊皮袋,交通十分不便。南有乌孙山脉,这更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西与苏联接壤,并且设有众多卡伦,卡伦内除

¹ 军机处《满文上谕档》,载贺灵:《锡伯族百科全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4页。

² 佟克力:《论锡伯族继承和使用满语满文的社会历史背景》,《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第94-99页。
余图肯:《论锡伯文和满文的源流关系》,《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34-39页。

主卡官兵外通常禁止闲杂人员流动，因此彼此往来与交流的机会也基本上不存在。在四个方位中只有东面没有天然屏障，但伊犁的政治、经济及军事中心惠远城在此。因此，锡伯族与东部的往来机会也不多。由此可见，察布查尔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锡伯族营军民自成单位，在这封闭、独立的区域里活动，为满语文的保留提供了客观条件。

再次，严格的八旗制度为满语、满文的保留提供了制度保障。锡伯族军民西迁到伊犁之后，先后编为八个牛录，一个牛录为一旗，被编为锡伯营。八旗兵丁，出则为兵，入则为农。同时清政府规定旗人禁止私自外出、经商、与民人（一般指汉人）通婚，交产等，这就使锡伯营八旗受到种种限制和约束，很少与汉人直接接触，从而有利于满语、满文的传承。这在清政府颁布的《回疆则例》中有明文规定，如兵过营中不得引进闲人，尤其不准外族人过夜；不允许八旗兵丁无事到回庄闲溜，更不允许过夜。违者除对当事者绳之以法外，对其长官也以管教不严加以惩处。清政府还制定了八旗营房制度十条，有旗人不准私自远出；不准经营商业，与民人争利；不准与民人交产；不准与民人通婚；旗人禁止仿效汉人装束等等。另外，还规定了没有指派的外出任务，未经告假，不准离城二十里（关外定四十里），擅离营地便以逃旗论处。同时，八旗余丁和眷属也同旗兵一样过着准军事生活。从这段史料记载来看，清政府对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与严格的限制，从而直接为锡伯族保留满语、满文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四，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不仅为锡伯族的生存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同时为锡伯族营造了学习满语、满文的物质环境。锡伯族在东北时就已具备了熟练的农业技术，当时享有美誉的“锡伯米”就是很好的证明。到了伊犁之后，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在清政府的政策下“自耕其食”，很快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和环境，自给自足，生产的粮食基本上满足了自身的需要。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相对高于周围的少数民族，是伊犁各营之首。尤其是察布查尔大渠的开凿成功，使得锡伯营成为伊犁其他诸营效仿的榜样。此外，畜牧业和相关家庭副业的发展也可以基本上满足锡伯营军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如此一来，锡伯营军民在这种比较富足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支配下，无须过多的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自然就与外界接触、交流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从而使锡伯营自成一体，这是锡伯族得以保持满语、满文的经济原因。

第五，清政府提倡“国语骑射”，并通过颁布一些相关律令来保护满语文作为国语的地位，作为八旗一员的锡伯族也同样受到这些政策法规的制约与影响。为提高满文作为国书的地位，清政府对满族官员使用满文做了相关规定，如：

奉清字上谕，不准用汉字复奏；满族大员补署各部院尚书各省督、抚等缺，在京谢恩用清字摺；旗员补放提镇奏谢，俱用清文；满洲提镇于公事摺用清字；西北两路将军、各陵守护大臣及奉宁、马兰两镇总兵，除地方公事用汉字奏摺外，其余谢恩、奏报雨雪等事，均用清字。¹

这虽然是对满族官员做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对新疆的八旗官员同样受用。清政府对新疆的八旗官员的各类文书往来也做了专门规定：

新疆所办事件，应用清字折奏……即有关涉地方事件，如清字折奏，有不明晰，亦应如盛京用清汉字兼写具奏……不可单用汉字奏折，将此通行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新疆驻

¹ 转引自胡增益《新疆地区满语文使用情况考略》，《民族语文》1995年第6期，第38—39页。

扎大臣等一体遵办。¹

官方文书往来如此,在民间,满文的使用范围也要比汉字等其他文字广泛,各少数民族也积极学习满语、满文。在若干规定和学习满语、满文文化氛围的影响和熏陶下,本来就操满语文的锡伯族更有利于继承和发扬满语文。

第六,锡伯族重视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也是满语、满文在清代得以完整保留下来的重要因素。西迁的锡伯族在清代不仅设有私塾,而且还有官办义学。并且教学的内容、手段、课程、教科书都是以满语、满文为主,或是满汉合璧教材。同时数量众多的各类满文书籍在锡伯族普通老百姓中的广泛流传也是其学习满语文的重要途径。这种主观上的积极因素对满语文的继承起到关键的作用。

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疆锡伯族人民为满语、满文的保存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4.3 学习和使用汉语文的情况

在清朝,作为非国语的汉语文,与满语、满文的社会地位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一方面,清政府提倡“国语骑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旗人学习汉语、汉文的步伐;另一方面,一些客观条件也不利于当时西迁的锡伯族人民学习汉语、汉文。这就使得锡伯族人民在接触、学习汉语文的过程当中困难重重,起步较晚。

嘉庆初年,给事中永祚奏请在伊犁地区设学专门教授汉文,但遭到嘉庆帝的严厉斥责。

大学士会同礼部议驳,给事中永祚奏请伊犁地方设学一折,所驳甚是。伊犁地处极边,多系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等游牧之地。迥非乌鲁木齐建立府、厅、州县,设有学额者可比。该处毗连外域,自当以娴习武备为重。若令其诵读汉文,势必荒疏艺勇,风气日趋于弱,于边防大有关碍。且屯田民户及流寓商贾来去无常,亦未必尽能读书识字。倘伊犁地方增设学额,则吉林、黑龙江等处烟户繁稠,不更当奏请设学乎?此事如系汉员陈奏,或尚云未能深悉边地情形。永祚系满洲,乃以断不可行之事摺拾陈请,太属不晓事体矣。至该给事中折内称,派官犯生监充当教习及效力赎罪之科甲出身废员充当主试,必系现在伊犁官犯中,有伊亲友在内,故有此沽名巧之奏。²

由此可见,嘉庆帝认为锡伯等族地处偏远之地,其首要任务是娴习武备以防边患,至于学习汉文对于他们这些“来去无常”之民并不适应。显然永祚的这一请求未能实现,但这并不能阻碍锡伯族人民学习汉文的愿望,虽然没有专门设学教授汉文,但在之前兴办的官办义学中还是能学到一定的汉语、汉文。这可以说是锡伯族人民学习汉语文的开始。

真正把学习汉语、汉文提上日程并付诸实践的是色布希贤,他谱写了锡伯族双语教学的新篇章。十九世纪末期,随着伊犁地区驻军数量和屯垦事业的日益发展,伊犁地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日益密切,各民族之间交流的机会也随之增加。于是,学习汉语、汉文的现实需要越来越受到广大锡伯族仁人志士的重视。色布希贤身为锡伯营总管,在创办学校教育把学习满文作为学生必修课程的同时,积极把汉语教学因素引入到学校教育当中。首先,他从锡伯营八个牛录义学里挑选三十余名优秀学童送到惠远城学习汉文,几年时间为锡伯营培养了一批精通汉语文的人才。这些人在后来锡伯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

¹ 《清高宗实录》卷 1250, 乾隆五十一年三月上戊申条, 第 24 册, 第 796 页。

² 《清仁宗实录》卷 108, 嘉庆八年二月丁未条, 第 29 册, 第 444 页。

在四、六牛录修建了校舍，挑选了一百多名学生学习汉语文。光绪十二年（1886 年），色布希贤经与惠远城官仓的徐老总协商，徐老总负责出资，从官仓办事人员中选了 3 名汉族人为教员，同时从锡伯、索伦营各牛录义学中挑选五六十名学习优异的学生送往惠远城官仓内专门学习汉语文，其教授的内容主要是儒家名著。此外，锡伯营领队大臣富尔固伦和锡伯族营领队大臣锡济尔琿也对锡伯族的汉语文教育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4.4 语言变迁的民族学分析

语言是人们互相进行交流的工具，文字则记录下人们在各个方面的活动情况，是向后人传递信息的载体。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双语是民族互动关系的反映。锡伯族不仅在现在，就是在古代也称得上是“翻译民族”。早在北魏时期，锡伯族先民就已学习汉语文。在蒙元时期，蒙古语文又成为他们广泛使用的语言、文字。至清代，锡伯族很快掌握了满语文，并充当满、蒙语翻译。迁居新疆的锡伯族虽然受八旗组织各方面规定的限制，但由于经常被调往各地参加戡乱战争，还要帮助兄弟民族发展农业生产，与其他民族的接触使锡伯族有了学习汉语及其他民族语言的机会。尤其是清代后期，现实的需要与锡伯族仁人志士对汉语的重视，使锡伯族的满—汉双语教育进入正规化发展阶段。

语言的选择是以优势民族（即在社会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及人口等方面占优势的民族集团）的语言为优先选择的。从满语文到汉语文的习得，体现了锡伯族对她所在社会优势语言的选择。这在当时（清朝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一个民族对他民族语言的接受程度，反映了该民族对那个民族文化的接纳程度。当一个民族完全抛弃了自己的母语而全部采用了他族的语言，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个民族接受了他民族的文化。人类学理论认为，语言影响着人的认知和思维，语言 and 世界观是相互作用的。透过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探讨锡伯族语言从满语到汉语的变化，是锡伯族移民对从满到汉（中华）文化的适应。汉语并非汉族所独有，汉语是中华民族大传统中最重要之文化要素之一，少数民族在拥有自己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又习得了汉语，无疑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结语

赖洪波曾这样评价西迁伊犁的锡伯人，他说“锡伯营是清代外来移民中最具活力、发展最为成功的移民集团。”¹ 他之所以给他们以这样高的评价，我认为可以归功于锡伯族军民排除万难“自耕自食”的艰苦奋斗精神和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高贵品质。回顾锡伯族人民有清一代在自己的第二故乡——新疆这片热土上的种种开发活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锡伯族移民与其它多个民族的移民一起“屯垦实边”，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对伊犁的开垦使当地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从而使伊犁地区的经济模式从“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将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文化转化成以农业为主的农耕文化。在清政府统一新疆前，即准噶尔统治西域时，伊犁地区的农业由于准噶尔迁来南疆的维吾尔人进行耕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西域图志》载：

准噶尔自策旺阿喇布坦时，征服回部，执其酋长拘于阿巴噶斯哈丹部，并移所属回民若干户至彼，为之耕种。²

清对准噶尔战争之后，出现了“数千里内，遂无一人”的荒凉景象，农业生产也遭到重创。随着清政府“移民实边”政策的实行，锡伯等族大批迁来，经过百余年的开发，北疆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富庶景象，伊犁地区作为当时新疆的政治中心更是重点农业开发地带。锡伯营作为当时诸营中经济实力最强的一支，农业生产不仅能满足本营各方面的需要，还经常成为其它诸营效仿的榜样。因而，在伊犁地区经济模式从“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的过程中，锡伯族人民勤劳的品质和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充分得到了体现和发挥，从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锡伯族农业生产成功为历史时期锡伯族人口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也为现代锡伯族人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锡伯族刚迁入伊犁时人口为 4030 人，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人口达到 8000 余人，至清末，人口则达到了 17000 人。³ 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锡伯族人口增长了 4.2 倍，这不得不归功于锡伯族人民农业生产的成功。历史上，由于过度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清代新疆锡伯族农业生产的不断扩大，人口的持续发展没有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而是使人地关系呈良性发展态势，为今天锡伯族人民继续开发伊犁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清代锡伯族人民在开发伊犁的同时做的又一贡献。

（二）驻守卡伦、换防台战是锡伯族军民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担负的重要使命，遇到外敌入侵、内部叛乱他们又常常被清政府派去抵御外侮、平定叛乱。尤其是在平定和卓后裔的一系列战事中，锡伯族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王希隆评价其说：“在四营中号称劲旅，战斗力最强。”⁴

（三）由于受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一个民族的迁徙必然会引起该民族文化的变迁。锡伯族从祖国的东北迁到大西北，各方面的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产生的直接作用和十分重要的作用便是使满语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得以保留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了现代锡伯语文。如今，除新疆外，东北及其它地方的锡伯族人，已经不再使用本民

¹ 赖洪波：《伊犁历代移民开发与世居民族的形成》，《新疆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第 32 页。

² 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卷 38，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505 页。

³ 侯伟丽：《新疆锡伯族人口发展及状况评析》，《西北史地》1995 年第 3 期，第 69 页。

⁴ 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03 页。

族的语言、文字。锡伯语言、文字作为满语文的继续及发展，对于研究清代历史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许多人将锡伯语说成是活着的满语，可见其重要现实及学术价值。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锡伯语言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其语言中出现了不少新词和借用词，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

参考文献

1. 古籍类

- [1] 清实录[Z]. 北京: 中华书局.
- [2] 赵尔巽撰. 清史稿[Z]. 北京: 中华书局.
- [3] 沈云龙主编 梁建章总纂. 西域水道记[Z].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6.
- [4] 钦定新疆识略[Z].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3.
- [5] (清)魏源撰 圣武记[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6] 钟兴麒 王豪 韩慧校注. 西域图志校注[Z].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
- [7] 西陲总统事略[Z].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3.
- [8] (清)贾桢等编辑. 筹办夷务始末[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9] 刘毓澍主编 梁建章总纂. 朔方备乘[Z].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6.
- [10] (清)七十一纂. 新疆輿图风土考[Z]. 上海: 上海点石斋, 1882.
- [11] 祁韵士辑. 西陲要略[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12]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 伊犁府志注释[Z]. 伊犁: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1985.
- [13] (清)傅恒奉敕撰 (清)于敏中等 (清)刘统勋奉敕撰.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Z].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2.

2. 著作类

- [1]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 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M]. 1963 年内部铅印.
- [2]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清代档案史料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3]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新疆简史[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0.
- [4]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锡伯族文学历史论文集[M]. 1981 年内部铅印.
- [5]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编写组.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 [6] 肖夫. 锡伯族简史[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6.
-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锡伯档案史料(上、下册)[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 [8] 方英楷. 新疆屯垦史[M].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89.
- [9] 王希隆. 清代西北屯田研究[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0.
- [10] 贺灵 佟克力. 锡伯族史[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 [11] 贺灵编. 锡伯族百科全书[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 [12] 赵予征. 丝绸之路屯垦研究[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 [13] 赵俪生主编. 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7.
- [14] 贺灵 佟克力. 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 [1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毛泽东屯垦思想研究会. 中国历代屯垦资料选注[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 [16] 贺灵 佟克力. 《历史·民族·文化》[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 [17] 蔡家艺. 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3. 论文

- [1] 博大政. 伊犁锡索察额四营沿革[J]. 瀚海潮. 1947. 1 卷(4、5).
- [2] 吴元丰 赵志强. 锡伯族西迁概述[J]. 民族研究. 1981(2).
- [3] 吴扎拉克尧. 锡伯族人口问题初论[J]. 学习与探索. 1982(2).
- [4] 徐鹏志 徐书典. 锡伯族西迁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壮举[J]. 黑龙江民族丛刊. 1985(3).
- [5] 佟克力. 伊犁锡伯营概述[J]. 新疆大学学报. 1985(4).
- [6] 涂钧勇. 澄清与锡伯族有关的几个史实[J]. 新疆文物. 1987(1).
- [7] 佟克力. 锡伯族西迁人口及修湟渠之我见[J]. 新疆历史研究. 1987(2).
- [8] 吴元丰. 清乾隆年间伊犁屯田述略[J]. 民族研究. 1987(5).
- [9] 张国杰. 清代锡伯族对新疆的贡献[J]. 西部学坛. 1988(2).
- [10] 佟克力. 新疆锡伯族的屯垦业绩及其历史地位[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1988(4).
- [11] 蔡永灏. 近年来锡伯族研究述评[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8(4).
- [12] 佟加·庆夫 瓜尔佳·文明. 察布查尔事业的奠基人—图伯特[J]. 满族研究. 1989(2).
- [13] 何荣伟 周凤敏. 锡伯索伦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J]. 满族研究. 1989(2).
- [14] 佟克力. 锡伯族研究资料和研究综述[J]. 满族研究. 1989(2).
- [15] 阎向东. 新疆锡伯语保存之原因[J]. 满族研究. 1990(2).
- [16] 佟克力. 解放前锡伯族文化教育发展概述[J]. 新疆大学学报. 1992(3).
- [17] 贺灵 佟克力. 锡伯族古代语言文字简论[J]. 语言与翻译. 1992(4).
- [18] 张雷军. 迁徙对锡伯族历史发展的影响[J].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4(1).
- [19] 贺忠德. 16 世纪以后锡伯族使用双语概述[J]. 西域研究 1995(2).
- [20] 侯伟丽. 新疆锡伯族人口发展状况评析[J]. 西北史地. 1995(3).
- [21] 胡增益. 新疆地区满语文使用情况考略[J]. 民族语文. 1995(6).
- [22] 赖洪波. 林则徐与伊犁湟渠[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1996(3).
- [23] 赵天. 沙俄占领伊犁时期锡伯族人民的反抗斗争[J]. 新疆教育学院学报. 1997(1).
- [24] 安双成. 锡伯族与满语文[J]. 满语研究. 1997(2).
- [25] 苏德善. 伊犁辛亥革命中的锡伯族[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1998(2).
- [26] 余吐肯. 论图伯特的历史贡献[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1998(4).
- [27] 包海鹰 吴克尧. 锡伯族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J]. 黑龙江民族丛刊. 1998(4).
- [28] 葛丰交. 锡伯族研究扫描[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1999(4).
- [29] 艾尼瓦尔·聂机木. 新疆锡伯族人口综合研究[J]. 西北人口. 2001(4).
- [30] 丁立军. 新疆锡伯族对祖国的伟大贡献[J]. 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 2002(3).
- [31] 何坚韧. 试论色布希贤的教育思想和历史功绩[J]. 民族教育研究. 2004(1).
- [32] 佟克力. 清代伊犁驻防八旗始末[J]. 西域研究. 2004(3).
- [33] 佟克力. 论锡伯族文化选择的历史轨迹[J]. 新疆大学学报. 2005(4).
- [34] 余吐肯. 论锡伯文和满文的源流关系[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2006(2).
- [35] 何永明. 锡伯族西迁对锡伯族文化的影响[J]. 西北民族研究 2006(2).
- [36] 佟克力. 锡伯族选择满语满文的文化意义[J]. 西域研究. 2006(3).
- [37] 阚耀平. 清代伊犁地区人口迁移研究[J]. 干旱区地理. 2006(6).

附录一

在学期间的各项成果

1. 所受奖励

- [1] 2005—2006 学年度荣获“优秀研究生”荣誉称号。
- [2] 2006—2007 学年度荣获“优秀研究生干部”荣誉称号。

2. 参加学术会议

- [1] 2006 年 7 月参加敦煌佛教与禅宗学术研讨会。
- [2] 2006 年 9 月参加法藏敦煌藏文文献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
- [3] 2007 年 7 月参加敦煌佛教的世俗化——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

3. 研究成果

- [1] 杨富学 安阳. 再论吐蕃出土蒙古文残片 TM92[J]. 甘肃民族研究. 2006(4).
- [2] 杨富学 安阳. 吐蕃帝国的西渐[J]. 安多研究. 2007(4).
- [3] 安阳. 试评汉—前赵之胡汉分治与重胡轻汉政策[J]. 民族学研究.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7.
- [4] 安阳. 北凉统治与高昌佛教[J]. 敦煌学辑刊. 2007(4).

4. 参与项目

- [1] 2005—2006 年参与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少数民族政权的民族政策研究”。
- [2] 2006—2007 年参与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吐蕃与周边民族佛教关系研究——以敦煌新疆出土文献为中心”。

附录二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在导师指导下所完成的论文及相关的作品，知识产权归属西北民族大学。本人完全了解西北民族大学有关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存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北民族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 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任何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本人离校后发表、使用学位论文或与该论文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或成果时，第一署名单位仍然为西北民族大学。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 张 强 导师签名 王 强 日期： 2008.5.25

附录三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本人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学位论文中凡引用他人已经发表或未发表的成果、数据、观点等，均已明确注明出处。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姜萍 日期： 2008.5.25

后记

在此论文草成之际，我要感谢我的导师王晓燕老师、赵学东教授和杨富学研究员。本文的写作倾注了三位老师大量的心血。

作为我的责任导师王晓燕老师，无论是从本人的论文选题还是到论文的撰写，都给了我许多的指导与建议。尤其是在本人论文写作过程中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修改我的论文，使我的毕业论文不断得到改进、充实。然学生天资愚钝，写出的东西肯定与老师的期望相差甚远。每想到此处，惴惴不安。

杨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时刻影响着我、鞭策着我不断前进。三年来，我曾无数次的踏进杨老师的办公室请教，而杨老师不管有多忙，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对我的论文进行指导，大到文章的谋篇布局，小到每一个注释。更让我感动和局促不安的是杨老师也曾无数次的亲自打电话，对论文中出现的问题一一指出，并把自己的新观点、新思想告知于我。

从本科到研究生，在历史文化学院学习了七年。七年来，赵老师一直是我的授业恩师，他系统的给我教授了北方民族史、藏族史等课程，由此引导我走向民族史研究的道路。在赵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顺利地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研究生期间，赵老师更是对我严加教导。在生活上，赵老师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此恩此情，铭记于心。

还要感谢七年的同窗好友丁丽萍，是她在生活中处处照顾我，伴我一同走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和三年难忘的研究生生活。尤其是在上研究生的三年里，是她无私地提供电脑让我查阅资料从而顺利地完成了论文的写作。

感谢三位老师，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老师，感谢曾经一起经历风风雨雨的同窗好友。

安 阳

2008年3月于西北民族大学